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王雪

(西安外国语学院 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 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 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 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 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 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 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关键词: 天主教; 陕西; 耶稣会士; 传教策略

中图分类号: K248.4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07)01-0076-04

16世纪,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 欧洲掀起了向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 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也再度回到了中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们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开始了他们的在华传教事业, 使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传教活动的扩展, 传教士的足迹也踏上了中国西部的土地。明末清初, 先后有十几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陕西, 其中包括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享有盛名的金尼阁、汤若望、南怀仁等。这些传教士在陕西开展了长期的传教活动, 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陕西天主教的发展首先是利玛窦传教路线的成功实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厚重的文化积淀,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认识到要使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中国民众接受天主教这样一种外来信仰, 必须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入手, 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将天主教的信仰逐步渗透到中国民众当中。因此, 利玛窦的指导思想就是首先同“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良好的关系, 争取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之后通过他们的影响, 再引导和争取下层民众。为此耶稣会士努力学习和熟悉中国的经典著作和风俗礼仪, 尽力沟通基

督教的教义与儒学的理论, 以中国的词汇观念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 并尽力使基督教的礼仪适应中国的习惯。同时, 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学识特长, 将传教与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 以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和军事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 让中国人通过西方的科学文化了解西方, 进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经过不懈的努力, 利玛窦的“学术传教”路线成功地打开了中国社会封闭的大门, 耶稣会士们同中国社会最有文化最有社会影响力的上流阶层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赢得了一批有身份、有地位、有学识的忠实的信徒, 他们为天主教在华传播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推动了天主教事业的发展。明末天主教传入陕西, 便是经由了这样一条途径。

明末最早将天主教带入陕西的是涇阳人王徵。王徵出身于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 自幼饱读诗书, 并且对古书中记载的种种神奇发明有极大兴趣。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起, 王徵曾多次入京赴考, 并于在天启二年(1622)中了进士。这二十多年中, 由于多次进京, 结识了当时在京城的一些西方传教士。王徵对西方传教士们介绍的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非常有兴趣, 因此与这些传教士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关系日益密切。在他们的影响和

收稿日期: 2006-12-10

基金项目: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

作者简介: 王雪(1956-)女, 吉林白城人, 西安外国语大学社科部副教授, 史学硕士。

吸引下,大约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王徵受洗入了天主教,成为明末陕西的第一位天主教徒。

天启五年(1625),王徵邀请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来陕西开教。金尼阁来泾阳为王徵家人施洗,并在其家设堂传教,自此,天主教开始在陕西传播。

金尼阁在基督教赴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曾到过中国的六个省份,去过所有的传教中心,熟悉汉语和儒家经典,对中国的社会习俗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他编著了《中国历史编年》,还将中国儒家的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出版,使西方人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为使来华的西方人士能够迅速掌握汉语,他在王徵的协助与合作下,完成了《西儒耳目资》一书。这是一部汉语教科书,它运用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使西方人可以很快地识读汉字,为中西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金尼阁创制的拼音方法,首次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以拉丁字母拼合汉字读音的方案,为汉字注音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现代文字改革提供了一条可贵的思路。^①

金尼阁在陕期间,金尼阁创办了一所印书铺,“所印汉文书籍甚多,拉丁文书籍亦有数种”,^{[1](P121)}为文化普及和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与此同时,金尼阁还积极开展传教活动,筹划购地建堂。但为使他有更多的闲暇编撰书籍,传教会决定把他调往杭州。大约在天启七年(1627)夏,金尼阁离陕赴杭州。

天启七年(1627)秋天,金尼阁离开陕西不久,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奉命来到西安接任教务。王徵与汤若望早在北京就已相识,此时更是全力相助,以推动陕西传教事业的发展。此时,传教士在陕西尚无固定的居住和传教场所,王徵先以银三百两为汤若望在西安购买了住所,又捐资五十两协助汤若望修建起一所小教堂。稍后汤若望又募集资金,修建了一所更大的教堂,从此天主教在陕西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传教事业正式起步。王徵取天主教“十诫”之首“钦崇一天主在万物之上”之意,将这所教堂命名为“崇一堂”,崇祯十一年(1638),王徵在家乡泾阳鲁桥镇(今属三原)也修建了一所“崇一堂”。

汤若望在西安期间,积极从事各种传教活动,在陕西奉行的仍然是上层传教路线。“当时在一切传教区之建立上,都是奉教的官吏们先把路子打开,扫除了立于最前面的困难的。陕西传教区之建立,亦是这样得以成功的。这些奉教官吏们对于教会之热心,乐意辅助,以及种种特殊功勋,传教会之年报中一经叙及,便不胜其赞扬夸奖。因此人们也是特别

努力劝化官吏们奉教的。所以传教差不多到处都有居于权要地位保护者和辅助者。这些人们的榜样对于人民也是能发生影响的。甚至不奉教的官吏们也为这个事业,就是他们的奉教的同寅同僚们那样热烈关心的传教事业,效尤促进,这一切的情形在中国的这个西北犄角古城里,马上就又要重演重现了”。^{[2](P105)}初起由于人们对天主教相当陌生,一时无法理解与接受,因此汤若望时常受到人们的嘲弄和攻击,甚至还被告上法庭。当时汤若望“受平民之侮辱,士大夫之轻视,外受毁谤,内感艰辛”,处境很困难。但是汤若望以其坚强的毅力,坚持做工作,消除人们的敌意和疑虑,使侮谤之风逐渐平息,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士大夫们对他的态度也越来越好。崇一堂就是在当地官吏的支持下建成的,建堂费用也基本都是从当地官吏那里募捐得来的。在开堂当日,就有50人受洗入教。^{[1](P169)}驻扎在西安的总督特地题写金字牌匾,隆重送往汤若望的住所,“赞美欧洲之科学与传教士汤若望之学识”。^{[2](P109)}

与汤若望同在陕西的还有葡萄牙人曾德昭。他于崇祯元年(1628)来到西安,从事建堂传教工作,崇祯二年离开西安。曾德昭在后来撰写的《大中国志》一书中记述了当时陕西的教务状况。书中记载基督教在陕西有良好的基础,在省城有一所教堂,还有教徒聚会的若干礼拜堂,传教工作富有成果。在陕期间,曾德昭还对记录唐时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在华活动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崇祯十一年(1638)他将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并加以注释,附在他所出版的中国教务报告书中。由于此书有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多种译本,因此影响极广,并由此引发了对此碑的研究热潮,同时也促进了陕西教务的发展。

在汤若望离开陕西后,又有傅汎际、方德望和杜奥定等耶稣会士来到陕西。崇祯三年至七年(1630-1634),傅汎际(葡萄牙),在西安建造教堂和教士住院,后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副省会长。杜奥定(意大利)在崇祯十年至十二年(1637-1639)间曾在山西陕西15个城市传教,其在陕西主持教务期间,成绩斐然,崇祯十一年(1638)杜奥定在西安府为400人授洗,这些人里面包括文人、内侍和宗室。第二年(1639)受洗入教的人更多,共有1240人,^{[1](P221)}其中甚至还有一些由异教而改信基督教的人。^{[3](P378)}杜奥定还以自己来华时在海上的艰险经历著成一

^① 《西儒耳目资》可以说是汉语拼音方案的最早蓝图。1957年,我国文字改革出版社重新影印出版了《西儒耳目资》作为讨论汉语拼音方案的借鉴。

文,由王徵和方德望于崇祯十年(1637)译成汉文,篇名为《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4](P322)}这是一篇关于17世纪东西方海上交通的珍贵文献。

方德望(法国)是明清之际在陕西时间最长的一位西方传教士,自崇祯八年(1635)来到陕西,到清顺治十六年(1659)在汉中去逝,长达24年。与利玛窦等人的上层传教策略不同,方德望在另一个方向找寻着向下层民众传教的切入点。面对不同的对象,传教士们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对于中国上流的知识阶层来说,新宗教吸引他们的是其教理中的精神文化蕴涵,而下层民众则关心的是新宗教的“实用性”。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下层民众的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方德望尽量将基督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基督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他深入民间,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基督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方德望在陕西传教,主要活动于陕南汉中、城固、洋县一带。至今当地仍流传着关于他的很多故事。方德望的传教方法卓有成效,仅1652年一年就有2699人受洗入教。^{[1](P209)}一直到19世纪,方德望当年生活过的村庄仍是天主教信仰的中心。^{[5](P139)}方德望本人也成了“圣人”,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方德望的事迹反映了耶稣会士们在中国下层社会传教策略的成功。

明清鼎革之际,战乱频仍,但陕西的教务并未停止。这时在西安的耶稣会士有郭纳爵和梅高。

郭纳爵(一名郭崇仁),葡萄牙人,崇祯七年(1634)来华。先在福州学习汉语,随后被派到陕西传教。他曾经在多个城市建造教堂,传教工作也颇有成效,崇祯十三年(1640)与方德望共为千余人授洗。郭纳爵尤其注重对士兵的教化工作,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之际,士兵们流动作战,时常更换戍所,驻守无数城市,他们每到一地,信教的士兵便会把天主教带到那里,使那里成为传教的

中心,在广东省就有由曾经在陕西经郭纳爵授洗的士兵成立的新堂口。^{[1](P224)}

在陕西的传教士还有一位意大利人李方西。李方西崇祯十三年(1640)来到中国后,便在陕西传教。顺治六年(1649)后一段时间到山东、淮安及澳门等地工作,顺治十六年(1659)又回到陕西。此时陕西教务已相当发达,西安府有教堂2所,各属县有教堂8所,各村镇有教堂50所,小堂则不计其数,另有住院13处。教民中有会团组织40个,都在积极劝化教外人人教,有些人甚至放弃自己的职业而专门去传教。李方西日夜操劳,仍不可能跑遍所有的地方,因而较远的地方便由那些受过训练的教民代他前去。这些虔诚的教民为传教也是竭尽全力,在他们的劝化下,省内各地又有成百上千的人受洗入教。有一个人甚至远到甘州劝化了300人人教。^{[1](P255)}

顺治十四年(1657)耶稣会士法国人穆格我来华,被派至陕西,管理汉中、城固等地教务。后应翰林院监修、川东道台许纘曾之邀赴四川传教,同时还兼管汉中、城固、小寨及陕南荒山中传教所数处。其间川陕两地教务皆有所发展;^{[1](P305)}比利时籍传教士南怀仁,顺治十六年(1659)来陕西传教,在陕工作了10个月,后经汤若望引荐被朝廷征召入京,纂修历法;^{[1](P342)}法国人李明,康熙二十七年(1688)被派至陕西,接管以前方德望神父的旧管区;^{[1](P441)}意大利人利国安,康熙三十六年(1697)来华,同年被派至陕西传教,在陕期间,积极推广教务,10个月内受洗者就达900余人。^{[1](P497)}此外,清初在陕西传教的还有西班牙人洪度亮,^{[1](P389)}意大利人张安当,^{[1](P387)}葡萄牙人何大经,^{[1](P469)}中国人何天章^{[1](P413)}及法国人卜纳爵等。^{[1](P502)}

明末清初,经过耶稣会传教士长达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天主教在陕西这个内陆省份扎了根。康熙三年(1664)时,陕西西安府已有天主教徒2万人,汉中府教徒达4万人。^{[6](P238)}当时全国11个主要传教区域(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江南)共有教徒15万余人^①,而陕西就占近40%,超过所有的省份,足见陕西教务之发达。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罗马教廷划分中国传教区时,陕西(包括甘肃、青海)成为正式宗座代牧区。此时陕西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一个重要基地。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如此兴盛,究其原因有:

首先是明朝天启年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陕西出土,证明早在唐代基督教的一支已传入中国,此事引起入华耶稣会士和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和

^① 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238—240页所列数据计算得出。

度重视。耶稣会士们见到碑文时极为兴奋,“这个拓本(按: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拓本)引起大家内心的欢悦,甚至欢呼雀跃,被作为一直期望和寻求的中国古基督教的明证,……因上帝的圣教,在当地发现一块保存下来的珍贵纪念物,这会使上帝高兴,他也会促使圣教在同一个地方得到恢复”。^{[7](P191)}曾德昭的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西方传教士的心理。景教碑的发现,证明了一千年前陕西地区就已有基督教,并流传了几百年,一度还极为兴盛,这对一心想使整个中国都皈依基督教的传教士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增强了他们的信心,而陕西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传教士心目中的圣地。对来陕的传教士来说,在这块圣地上恢复继承基督教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有着重大的意义,因而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驱使他们努力去拓展教务。

其次,明末清初时陕西虽已不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仍然是西北重镇,对周边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要使天主教在中国西北部地区传播开来,首先必须发展陕西的教务,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向西拓展的一个有利的根据地,这对天主教的进一步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陕西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华的传教总会陕西的传教工作非常重视,明末清初那些享有盛名的传教士中不少人都来过陕西。在明末清初的六七十年间,派来陕西的传教士几乎没有间断过,几十年间,薪尽火传,终于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华的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即便是在后来雍、乾、嘉、道一百几十年清廷严厉禁教政策的打击下,陕西的天主教也没有停止过活动。

再有一点,便是耶稣会士们的成功的传教策略。作为外来文化的代表者,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并没有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试图改变中国传统的姿态向中国民众灌输其宗教思想,而是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的角度出发,以一种谦和的态度,深入到中国民众当中,深入了解中国的民情、文化,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需求,从不同的切入点以不同的方式将基督教的信仰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土壤之中,使其得到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在传教过程中,在陕西的传教士们很好地奉行了“上层”和“下层”两条腿走路的传教方针,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使天主教在陕西能够深入各个阶层,拥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因而获得了显著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费赖之.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 冯承钧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2] 魏特. 汤若望传[M]. 杨丙辰译. 商务印书馆, 1949.
- [3]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4] 宋伯胤. 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M]. 西安: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90.
- [5] 谢和耐. 中国和基督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6]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影印本)[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0.
- [7] 曾德昭. 大中国志[M]. 何高济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陈正奇]

Catholicism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Early Qing Dynasty

WANG Xue

(Dept.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Xi'an 710061,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iscovery of new lands and sea route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Early Qing Dynasty, overseas colonization and religious preaching became popular in Europe. Christianity returned to China again after 200 years' disappearance. Shaanxi Province was a key area for missionary works.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and strategies, JIN ni-ge, TANG Ruo-wang, FANG De-wang and some other Catholics preached Catholicism among both scholar-officials and common people, thus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Catholicism in Shaanxi Province which gradually became an important base of Catholicism in Inland China.

Key Words: Catholicism; Shaanxi; Christianity missionary; strategy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作者: [王雪](#), [WANG Xue](#)
 作者单位: [西安外国语学院, 社科部, 陕西, 西安, 710061](#)
 刊名: [唐都学刊](#)
 英文刊名: [TANGDU JOURNAL](#)
 年, 卷(期): 2007, 23(1)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9条)

1.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2. 魏特. [杨丙辰 汤若望传](#) 1949
3.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1989
4. 宋伯胤. [明泾阳王微先生年谱](#) 1990
5. 谢和耐. [中国和基督教](#) 1991
6.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1990
7. 曾德昭. [何高济 大中国志](#) 1998
8. [西儒耳目资](#) 1957
9. 徐宗泽.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张晓虹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 \(6\)](#)
 同治年间, 因回民起义“不杀在(天主)教人”, 引发了陕西汉族百姓纷纷皈依天主教以避战乱, 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 从而揭示出清代末年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2. 期刊论文 [汤开建. 马占军 晚清天主教在陕西三边的传播 -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41 \(4\)](#)
 利用〈教案教务档〉、〈清末教案〉等清宫档案资料及其他第一手材料, 结合西人著作, 对圣母圣心会在1874年到1914年间在陕西三边地区的传教活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展现了圣母圣心会在陕西三边传教的概貌.
3. 期刊论文 [阎华. YAN Hua 通远坊天主教发展现状概述 -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3\(1\)](#)
 通远坊天主教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天主教活动中心, 历来在关中天主教的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立足于介绍天主教在当地发展现状, 包括此地教区总体发展情况、教堂建筑介绍、教堂内部职位设置、教堂所属各机构及管理情况. 此外还介绍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以及给当地带来的影响等方面.
4. 学位论文 [冯建萍 陕西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活动研究\(1696-1949\) 2009](#)
 方济各会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天主教教会之一, 在陕西的天主教传播史上, 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后, 方济各会传教士为了保证中国天主教传播工作的延续, 领取了清政府颁发的“印票”, 得以在中国继续传教. 在陕西, 方济各会取代了耶稣会在教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成为天主教在陕西传播的主要力量.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 天主教陕西代牧区成立, 罗马教廷任命方济各会士叶宗贤为首任代牧主教, 方济各会全面接手陕西的传教活动, 并将传教总堂设立在陕西泾阳县桥镇.“鸦片战争”后, 方济各会凭借西方侵略势力和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条款”, 抓住一切时机发展教务.“1862年的回民起义”、“1878年陕西特大旱灾”、“义和团运动”等特定历史事件, 都为方济各会在陕西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利用这些机会, 方济各会建立了高陵通远坊传教基地, 并在此基础上修建主教府, 使之成为陕西, 乃至西北地区的天主教传教中心. 在西安修建天主教南堂等传教场所, 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入教, 扩大了方济各会的影响. 民国时期, 陕西形成八大教区的格局, 方济各会占据了汉中、延安、西安、整屋、凤翔、同州、安康和三江八大教区中, 除了汉中以外其他七个教区的领导权. 在传教过程中方济各会以“面向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 坚持“清贫福音”的传教路线, 与耶稣会传教策略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传教特点使得方济各会在陕西的传教工作得以持续发展.
5. 期刊论文 [李大海. 吴宏岐. Li Dahai. Wu Hongqi 清末民初陕北天主教传播过程时空特征分析 -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 21\(1\)](#)
 清末民初是天主教在陕北地区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当时陕北23个县中有天主教传入的占19个, 广大农村是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地区, 清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即1901至1911年是陕北天主教发展的高潮期. 陕北地区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与山西之间的37. 5. N~38. 5. N间呈东宽西窄的横楔形区域内, 形成了一个天主教堂分布的相对集中区, 其中又以西部靖边、怀远(今横山)和定边三县为天主教势力集中的重心所在. 县域内天主教堂的空间分布也具有一定的规律. 本文主要依据相关地方志, 简要说明清末民初天主教在陕北地区的传播过程并初步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
6. 期刊论文 [王雪. Wang Xue 从南怀谦摄影集看清末民初陕南天主教的发展 - 文博2008, "" \(6\)](#)
 一百年前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南怀谦用他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年代真实的影像. 透过南怀谦的镜头, 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直观地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及20世纪初天主教在陕西南部的发展状况, 这对了解与分析印证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历史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7. 期刊论文 [梁济邦 天主教在日本的传入及其影响 -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 3\(3\)](#)
 本文阐述了16世纪中叶天主教在日本最初传播的情形, 进而对其给日本社会的影响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使读者了解近代日本社会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外来文化的传入及其历史意义.
8. 期刊论文 [支强 试析清代“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的形成——以“张铎德案件”为中心 - 法制与社会2008, "" \(24\)](#)
 〈大清律例〉之中一度载有“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 作为清朝统治者制裁天主教传习活动的最主要的法律依据, 却至今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未见专

门的研究成果产生. 本文主要利用清代档案资料, 从清代长期的禁教政策以及条例产生的独特时代背景出发, 通过对嘉庆十六年发生在陕西的“张铎德案件”的考证、分析, 着重论述了这一条例的产生过程.

9. 学位论文 [闫华 晚清民国时期高陵天主教发展史研究](#) 2010

高陵地区天主教从晚清时期开始正式传入当地, 发展至民国末年, 经历了百年的历史。在这个阶段中, 其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传教活动的起步和传教基地的建立、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初步发展、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持续发展、民国的恢复与发展等四个主要的阶段。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 中国的国门被打开, 并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而不平等条约对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大力传播和发展提供重要的保证, 高陵天主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迅速发展的。在这个时期, 历任主教充分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适时的调整传教策略和方针, 使得天主教在当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 他们致力于修建教会各种建筑, 完善教会内部各种机构和设施, 由此在当地及陕西教区形成巨大的影响, 最终发展成为陕西地区名副其实的传教中心, 在陕西天主教历史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且, 教会在发展过程中兴办教会学校及各类慈善事业, 在当地形成较好的影响, 并且客观上推动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高陵, 通远坊, 天主教, 主教, 信徒

10. 期刊论文 [闫敏. Yan Min 帕勒斯特里那《马切洛斯教皇弥撒曲》分析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 26(3)

《马切洛斯教皇弥撒曲》是帕勒斯特里纳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 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以高超的复调音乐技巧表现出了纯净、朴素、虔诚、肃穆的情绪, 被誉为天主教纯正音乐理想的典范, 在其中我们完全被一种具有沉思、静谧、和谐的美感所打动和感染, 他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对宗教的理解。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dxk200701020.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856bd70e-c312-40e9-b529-9e4d0080891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